

“三圈说”

——中国人类学汉人、少数民族、海外研究的学术遗产*

王铭铭



主讲人简介

王铭铭,1992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3年,在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至1994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

* 本文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外事兼科研助理黄倩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作者本人审阅。

特聘教授、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评论网主持人,中国人类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评论》主编,《人文世界》年刊主编,中国文学人类学会副会长,法国国际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海外会员,英国《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学术编委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等。主要论著有《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等十余部,译著有《社会的构成》、《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数部。

时 间:2008年9月26日19:00

地 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

主持人: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评论人: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在复旦讲座,我感到很紧张。我的讲座可能和大家昨天听

到的不一样,昨天萨林斯教授讲得很严谨,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然后读出来。我则没有一个预先的准备,只有一个提纲。刚刚吃饭的时候,邓正来院长已经批评了我的这个坏习惯,令人紧张啊!另外,这一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在综合大学有这么多的听众,我十分感激,也很紧张。我一般只能在像云南民族大学那样的地方才有那么多听众。前一两个月到厦门大学做讲座,那还是我的母校,系里的负责人召集得很累,却只来了十来个人,而且都是本科生。今天我觉得非常兴奋,原因还有潘天舒教授在场。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去哈佛访问,当年还被潘教授的导师安排住在据说是一个名人住过的房间里,现在宾馆的邀请函我还珍藏着。当时,每天都有潘教授相伴,谈天说地,今天居然能在复旦和他相聚,也感到很荣幸。

我尽量简短,把题目上谈的问题稍加介绍,留下更多时间,期待得到更多的讨论。

所谓“三圈”的谈法自从2003年以来在我写的文章里已不断地出现,但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系统地谈用它来形容中国人类学到底指的是什么。以此,我也希望得到邓老师和潘天舒老师以及在座的同事、同学们的指教。

我想“三圈”这个问题跟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面对的一些问题和成就有密切关系。现在离2003年已经有五年了。2003年,中国学者开始整理中国学术界“改革后”的“国故”。许多杂志邀请各学科的专家去写二十五年的情况,去思考我们二十五年做了些什么、有什么局限。五年过去以后,今年邓正来教授也主编了一本相关的书,蛮有影响的书,我荣幸地在该书

里占一个章节的篇幅,但我今天要表示道歉:我给老邓的那篇文章是改革后中国人类学二十五年时写的,后来又加上两三句话,然后充当了“三十年”,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中国学术界可能是为这二十五年或是这三十年感到过于光荣了。近来,多门学科都在出版总结这三十年成果的书,看来,总结这三十年已成为了一个风潮。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总结,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总结、怎样定位这三十年,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认为,用时间渐进积累的模式来看 19 世纪末到今天个别学科的积累,或者说看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中国各门学科的积累,当然无可厚非,但也有些问题。以我们人类学界为例,过去出过关于人类学史的书,一本是王建民等人写的《中国民族学史》,另一本是胡鸿保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还有老一代民族学家编的《民族学纵横》,它们都采用时间积累性的方式来写我们学科的历史。我读这些书受到很多启发。如我后面要谈到的,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确实有不少积累的。但对于写知识积累的书,我有一些疑惑。时间积累性的论述要求被论述的知识体系是演化的,可事实好像并不如此。我认为,现在中国人类学的水平远远不如六十年前。

怎么说呢?最近,我到西南比较多。原来在东南老家,很多信息很熟悉,坐井观天,就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觉得自己很牛。到了西南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无知。我到过的村寨都有我前辈留下的足迹,他们论著中对这些地方的描述,其细致的程度、理论的含量、对整个文化整体的把握远远超过我今天所

做的。1999年,我组织了一个“人类学再研究的课题”,对二战期间滇缅公路沿线的三个村庄进行重新研究,追踪至今,试图发现它们自身的一些变化、研究者观念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启发。感想其实比较深重。这三十年,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很多装模作样的调查研究,但事实上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至少没有说明我们这门学科有什么发展。因此,我渐渐地相信,总结我们过去三十年人文科学的成就,不能不看整个中国从19世纪末到今天做了什么、有什么时代变化、有什么空间关怀。

我相信,从“三圈说”的角度来看这门学科有助于在历史的基础上重新展望未来,看看我们这个学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以上是一个简短的导论。在导论之后,我想说,“三圈说”听起来很像我前几年和一些朋友谈到的,也就是我在“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一讲评论萨林斯时谈到的关于“天下观”的说法。十年来关于“天下”的论述出现了很多,首先是经济学界,再到人类学界和哲学界,现在已经渐渐冷淡下去了。今天,我想还是围绕相关问题来谈谈。要澄清的是,所谓“三圈说”的启发来自西方。我认为,西方人类学,如果不从其历史的积累看,而是从其视野看,则是对三个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三个世界就是我说的“三圈”,分别是离西方最遥远的原始社会、离西方相对近些的古式社会或者古代社会以及欧洲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我说的“三圈”是指这门学科在空间上所表现的世界观。

如果在座的没有学过人类学,对它可能不太能理解。时下

中国学界对于人类学依旧没有一致的定义。我主编的《中国人类学评论》现在被北大图书馆列在生物学书架中。我们中国的核心人类学期刊《中国人类学学报》，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发表文章的一个论坛。怎么可以说人类学是对原始社会、古式社会以及欧洲近代文明构成的“三个世界”的研究呢？而我自己比在座的年轻朋友们多读了几年的书，我的感想是：任何人类学的著作都在思考这“三圈”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关系。

从19世纪中期到今天，人类学家看这“三圈”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历程。最早，我们学科处在人类学的古典时代，即用进化的理论去看世界。怎么解释进化论呢？我认为就是对这“三圈”之间关系的历史时间性的解释。也就是说，在进化论人类学家看来，这三个圈子有一种历史的时间关系：原始社会因为离西方最遥远，所以也最古老；古式社会（包括中国在内），也叫古代社会，和欧洲的古罗马是一个时代；而欧洲近代的文明则是最近代的，现在叫“现代性”。这三个社会形态构成一条时间的线，这条线是进化论的时间根据。

欧洲人类学的第二个时代是恢复“三圈”的空间秩序本身，但还是用时间来解释这三圈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期，人类学的时间性产生了一个巨变，“传播论”出台了。“传播论”大概产生于19世纪末期，在20世纪初期的欧洲非常盛行，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甚至是今天的台湾地区，仍有还健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在追随它。“传播论”者认为，不见得离欧洲最遥远的地方就是在时间上最古老的，远方的文化很可能是落后的，但落

后不是因为要准备进步到近代欧洲文明,而只不过是某些古代文明衰败使然。也就是说,今天看到的原始社会是古代辉煌文明衰败的后果。文明与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时间性的,但这种时间性不是递进式的,而是反之。

20 世纪初期,“三圈”的关系产生了另外一个巨变,进化的和传播的历史观都被社会科学所取代。在 19 世纪的时候,人类学很接近于现在的人文学。但是到 20 世纪初期,开始社会科学化。这个时候,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人类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人类学家该做什么。这三个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的学派。20 世纪初期人类学的特征是:不断对欧洲与原始社会进行对照,用自我与他者的反差来思考理论。随着自我与他者二元化世界观的出现,“三圈”里的第二圈就渐渐在人类学论述里消失了。法国人类学可能是例外,在这一人类学学派里,第二圈还是保留得比较完整;法国人类学与社会学对古代社会给予过集中关注。可是,国际上“主流”人类学为了理论建构,多数人类学家基本上是把这个阶段给抹掉了。这样一来,人类学所论述中的世界就剩下了文明与野蛮的两相对照。在英国,情况就比较严重。英国这个时候出现了“功能学派”。“功能学派”只主张研究简单社会,他们对于古老的复杂文明的研究十分排斥,总想寻找一些简单的可以与欧洲近代对比的原始部落来研究。

我们可以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先生的评论来理解这个阶段的他者观念。马林诺夫斯基在 1939 年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评价道,费孝通先生的这本著作是人类学的

一个里程碑。他是从两个意义上说它是里程碑：一个方面是土著人研究土著人的人类学的第一个里程碑（但这让我觉得是在侮辱我们，我们已经是文明人了，才不是土著人呢！）；另一个方面是说费孝通是第一个研究文明社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江村经济》也是里程碑。那就是说，费孝通之前是没有人研究文明社会的。是这样的吗？我看这个说法只不过是针对“功能学派”自身而言。在“功能学派”内部，在费孝通之前，的确是由欧洲人研究野蛮的原始社会的；从费孝通开始，才有人来研究文明中的农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 20 世纪以前没有人类学家研究过中国、没有人类学家研究过文明社会。20 世纪初他者观念的出现使得中间的古式社会消失了，因而才使中国研究成为里程碑。

应当承认，那个时代百花齐放，我刚刚说的只是一些粗浅的、不一定准确的说法；但是，如果仔细推敲，我们还可以发现，“功能学派”确实是建立在以上所说的他者和自我两相对应的观点之上的。

这个时代过去以后，各国的人类学可以说被法国人类学一网打尽。不同的人人类学派都想从法国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学到东西。昨天晚上给我们做讲座的萨林斯教授，他的导师叫 Leslie White，他很尊重他的导师，最近写了很多文章回忆他的导师，但是，他实际上是 White 的一个“叛徒”——萨林斯所做的就是“投靠”了法国结构人类学。当然，这种“投靠”是好的。好的学问为什么不可以“投靠”呢？这是没问题的。结构主义时代的人类学特点是什么？它在“三圈”解释上的特

点是什么？也是基于前面一段的自我和他者的二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引用的素材很多是来自于“三圈”中的中间那个圈，即古式社会。但是他的理论永远在关注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所有思想的基础）——这是通过所有亲属研究、神话研究来论证的。他想打破自我和他者两相对应的局面。可是，我认为，他在打破这种局面的过程当中也采纳了前面一个阶段的自我和他者两分的关系。

到了后结构主义时代，包括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人类学家都在对这“三圈”的内容进行重新认识。当然出现过很多论调，这些论调可以说都是反文化相对主义的，就是反对把人和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区分看得那么重。这个时代，特别痛恨“他者”这两个字。当你看人类学的书，当看到“other”或者动名词“othering”的时候，其意思就相当于“妖魔化”。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在用他者的眼光看待别文化便被认为是有问题。那什么是没问题的呢？这里又有几个概念。人需要生活的，人要生活，人要追求权力，支配他人，并有抵抗他人对自己支配的欲望。在任何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都是存在着关系的，比如说原始社会、古式社会和近代文明之间是存在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因为在政治、经济上是不平等的，所以不能简单地通过他们的文化去研究，而应该采用像马克思这样的观点来批判地看这三个圈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批判当然很多，最近少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兴起的“政治经济学派”就对这三个圈子的关系进行了世界体系理论的解释。

直到晚近的 90 年代出现的全球化理论也是对这“三圈”进行解释。但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味道不一定那么浓厚,因为有的人类学家已经堕落成了只为基金会干活而不想别的的境地了。这样你写研究建议书,写上“globalization”(全球化),大概就很容易拿到经费,全世界的人类学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那么,什么是“globalization”呢?可以说,这个概念的作者试图用一个中性的方式来解释“三圈”之间的关系。这种“中性”可以说是靠基金会活着,并没有看到世界上确实存在这三个世界。但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某个文化被另一个文化所“globalize”,它是层层叠叠,一层又一层的,有的地方的文化历史比较深厚,有的地方的文化是没有历史的。所有的古式社会都是重视过去的,所有的神话社会也都是重视过去的,但是对于这种原始社会来说,过去就等于今天,而对近代欧洲的文明来说,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在欧洲近代文明出现之后,以目的论为主导的理性主义思想成为主流。理性主义很复杂,不是我今天可以讨论清楚的。一个可以在此指出现象是:理性主义现在在世界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在过去三十年来西方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中,理性主义支配地位的形成致使“三圈”关系的论述简单化了。理性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解释,它的观念体系往往来自于西方,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权力、个体等观念相关,用这些来解释人文科学的问题,推己及人,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以上所讲,我借用自己的“三圈说”“生硬地”解释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流变史。接着,我还想“生硬地”再度建构出一个新

的“三圈”，然后再把它套到“生硬”的理论认识当中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理论衍生的规律。我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类学，如果不讨论三个世界、三个圈子的关系是很难有理论上的启发的。而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人类学就变得越来越少有启发。“三圈说”的来源大概就是这样。

让我们再从“三圈”的角度看看中国人类学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问题以及学科史的概况。

一般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已有一百年了（我们按照学科规范，把人类学传入的时间定为清末，而不管帝制时代已经出现的异文化知识，这样到今天人类学的历史有一百年出头），但我认为是更久。我们人类学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我觉得，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有一个不怎么令人喜悦的演变，那就是，它从 19 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期间尚且具备宏大眼光渐渐“演进”成今日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论述。19 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史”是不对称的、不成比例的。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力越强，眼界就越宽广，到目前为止，看来是大致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表述的世界观在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学者当中存在吗？邓老师是大哥级的人物，但是我敢说，包括他在内的我们这代人都是非常悲哀的！我们渐渐失去了 19 世纪中期魏源们所具备的心态。我认为，今日我们的社会科学之所以很悲哀，是因为它大致可谓是美国式汉学的一个分论。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不真正研究社会科学，而是看现在美国某个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怎么研究中国，

再决定自己研究什么。固然,我们应承认,美国的汉学是非常社会科学化的,它跟法国的汉学、英国的汉学之所以不同,就因为它是社会科学化的汉学。所以,学习美国汉学还有点儿用,这是无疑的。但我认为这是有局限性的。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家看美国汉学家在做什么,比如,国外有人正在搞妈祖研究,那我就搞妈祖研究;另一些在搞 medical anthropology(医学人类学)研究;那我就搞 medical anthropology(医学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些在搞 social memory(社会记忆)、resistance(抵抗)研究,我就跟着搞。其他学科可能更为严重。比如,有研究中国政治学、经济学的学者总是围着美国汉学家的论述转。我们以为自己在搞中国学术,却不见得是。我们难以幸免于不这么模仿,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中国社会科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看,中国社会科学就人类学而言,有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却自我国际化——它到处找研究中国的踪影,在全世界搜罗哪里的学问中有中国的影子,就把它纳入我们国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百年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所走过的历程就是这样不断“中国化”、再“中国化”、再再“中国化”的,而没有像 19 世纪的西方人类学那样有一个“三圈”的世界观。

前面我说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不像西方的人类学体系有层层叠叠的社会关系思考,那么,这个学科的历程大体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将粗略地分几个阶段来说明。

翻译是我们社会科学的起源。因为中国古代不存在社会科学,我们有社会思想,为了获得社会科学,我们的前辈就投身

于翻译事业中了。在他们的翻译作品当中，特别是在严复的译作中，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但复杂性掩盖不了一个强烈的追求——在这些文本中贯穿始终的是个“强”字。谁的“强”呢？当然是中国的“强”；中国为什么要“强”呢？因为它弱。任何中国的学科史都在说这么一个道理。这个大概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

其实，中国社会科学的“强学”追求并没那么糟糕。从一个角度看，它是很有世界关怀的。我们的前辈从日本转译西学来说自己的事，充分表现出他们还是有他者的关怀。翻译就是“他者为上”。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国民政府筹备中央研究院同时，国人开始不满足于翻译了，想要建立自己的、跟西方一一对应的学科体系。今年年初，我曾带不少师生去四川李庄，那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期间的阵地。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干什么的？它里面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汇集地。在小小李庄，存在许多被称为“第一个什么”的人。李庄的一个导游就向我们介绍说，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铲”。中国考古学家的工具之一是洛阳盗墓贼的探铲，李先生拿的就是那个，但我们却说他是引进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人，而没有说他在这当中继承了“传统”的哪些因素。像李济先生这样一个留学美国的人，要创造一个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借助的东西可谓多了，但他却主要以现代学科代表的面目出现。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范。那时的学科带头人自己可以读懂外文，并不需要翻译，脑

子中充斥着的是怎样运用中国的智慧和外国的智慧来奠定一个中国的近代的学科。这种倾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得到了强化。

可以说,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从“翻译启蒙”转入到了“学科建设”的阶段。此时,学科的民族自我意识更强了,尽管学者们相信的都是现代西方的东西。

50年代,人类学产生了一些变化。研究人的生物性的去了科学院,研究人的社会性的主要去了中央民族学院。为了处理民族问题,综合大学中的大量社会科学家被调到民族学院去,这就造成了一个以民族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的时代。当时的前辈先是研究哪些是少数民族这个问题,这叫“民族识别工作”。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容易出现争议——你是什么民族,这很难确定。正好斯大林先生是苏联的少数民族,所以对少数民族问题很有体会,提出了民族的标准,这个我就不讲了。当时人类学这个名称不许叫了,人类学家都活着,有一些去了台湾,到了“中研院”,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所”,今天这个机构还在,他们多数是50年代以前的“南派”。留在内地的都是诸如燕京大学这样的教学机构的师生。那些由教会等社团在华创办的大学很奇怪,虽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跟外国有关,却往往产生“左倾”思想,其师生对新中国抱有很高的理想。像燕大就出现了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是反对蒋介石的,不可能去台湾的,这样就跟中央研究院分道扬镳了。留下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只能做做民族学、民族研究。先是民族识别,接着是社会形态研究。民族识别还有些道理,至少它还有一些标准,比如

说的话不一样、文字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自然是有理由区分的。但社会形态研究就很有趣了,像我刚才说的,它回到了西方人类学的19世纪,把西方人类学所说的三个世界套到中国来,在中国寻找原始社会、古式社会、近代欧洲文明相等同的社会形态,把56个民族有的放在原始社会,有的放在古式社会(如农奴、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上很少放在欧洲近代文明那个时代。问题当然是有,有些少数民族早已进入了欧洲近代文明的时期。比如白族,社会形态研究者将他们所处的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其实,在白族的名镇喜洲等地早有四大家族这样的资本主义商业力量,深受近代文明的影响。这个小镇经济上是全国性的,其四大家族曾支配当地的经济,而且跟上海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说它是封建社会呢?至少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低半级嘛,如果说白族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就跟上海一样了,它有四大家族,和上海的“青红帮”什么的一样,那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开来呢?这当然是有一定目的的。我们在国内也建立了它的“三圈”,这个我后面会谈到。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是在这样的历史中做人类学的。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类学本科生,感到很荣耀。为什么荣耀呢?因为以前都不让上以人类学为名的本科,1981年才允许人类学有本科,现在又被消灭了,而我当时本科读的专业就是人类学。现在这个专业的学生都得拿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本科文凭,要拿人类学的没门儿,因为教育部没有这个本科,但研究生就有。我们这代大概就是这样成长起来

的。这样的成长背景会让我们有点儿激动，因为读的这个东西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像嫁给一个人之后，人家说你是“小老婆”。“小老婆”总要争取名分，于是就比较激动，比较想把人类学搞上去。过于激动也不好，像我这样，想搞这样那样的活动，结果导致一些误会。人类学出现很多口号，有一种叫人类学西化的口号，像我就曾经被认为是被西化的人类学者，有的人传我90年代回来是要“清理门户”，说我这个人特别不友善，进入中国人类学界就是要清理门户，后来又有传闻说王铭铭要来搞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因为当时我写了一些西方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出现了很多很多口号。不过，激动也许也有好处——好处是易于对所做的事业有积极性。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类学就是在激动下促成其学科重建的。过去三十年来，翻译工作做了很多。现在几乎可以用汉语来教人类学了，这是改革以后人类学的一个伟大之处。现在许多人类学经典之作都有了中文版，使人感到很荣耀。第二个荣耀就是：我们现在自称为人类学家的至少已有4500人，这个数字非常厉害。国内居然有4500个人类学家！明年将会有世界人类学大会在昆明召开，要举办5500人的大会。但是，据我所知能来的外国人不超过100人，因此中国的人类学家应该是5400个，我就是1/5400。这当然是个进步，这至少说明那么多人对人类学感兴趣。这个是第二大成就。但是这个成就里面包含了问题。这个问题你们应该都可以看出来，我就不再多说了。第三个荣耀就是，在综合院校普遍出现了人类学学科。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科学在高校中基本上是很难生存的，只有人文学。改革开放以

后,社会科学在综合院校中得到建设,渐渐出现了有人类学存在的综合性大学。以前的人类学专业以民族学为名,出现在八大民族院校里。今天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院校不是民族大学,都在搞人类学,这是一大进步。

中国人类学,一百多年来向来没有自己的杂志。但是,现在的人类学家都想把自己所在学校的学报改造成人类学杂志。举个例子,就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它居然专门刊发人类学论文,成为中国人类学核心期刊。还有,我有个学生叫赵旭东,到了中国农业大学担任教授,居然还“混”上了学报的常务副主编,结果,现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的内容几乎和美国的《美国人类学家》是一样的。《民族研究》以前看到人类学的文章总是先灭掉再说,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但现在人类学的文章在那个杂志上很容易登出来。我也好不容易混了一个“985”专家,结果也办了一个杂志——《中国人类学评论》,也让我很有成就感。

繁荣是一面,繁荣下面还有另一面。现在学科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人数太多、杂志太多的问题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今天要谈的比较尖锐,这是受邓正来老师多年来的影响和刺激(他对中国社会科学贡献很大,大家不要小看他,他来复旦大学可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如果说不,请批评。

我们国家人类学发展近三十年,培养了很多,我也推荐了很多人到美国读书。在国内,我带的博士生在学的就有二十几位,全国5400多个人类学者加起来,如果一个人带十个博士生的话,那就有五万多个博士生。五万多个博士要多少大学来

养？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说的尖锐问题是：我们中国的人类学没脑子，我们不思考，我们只实践。萨林斯教授昨天说了非常启发人的话：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学家只研究民族志，他们是为理论思考者提供素材的，理论的活儿都是文化理论家干的，人类学家就是搞民族志。萨林斯本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志作者。我们国内的人即使是做理论也是当做实践来做——我们不喜欢思考，我们喜欢用这种东西当做工具来谋求一种职业，来骗骗老外（当有什么国难的时候，老外同情的眼泪流出来之后，我们课题的申请报告往那儿一递，就有几十万元进来）。这就造成我们这门学科不仅是没脑子，而且没有独立的思考。我们都在模仿，甚至连模仿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们只是在探听，有一个老外来了，我们在探听他在干什么。北京、上海当然好一点儿，如果像我这样经常各省去跑的人就会发现：我们的那些同行，教授、博导、院长、校长，看到一个老外来了就围着他问在搞什么，老外都很热情。比如，在座有位老外叫“啤酒”。“啤酒”先生在搞性文化，这句话让我听到了没关系，如果让其他人听到，全校的人不管是人类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全部搞性文化了，就全部一拥而上。他们却不想想“啤酒”先生为什么要搞 sex，他们不想。他们就是只管我最近听说美国人在搞什么，我们也要搞啊。

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另外一派的是搞“本土化”研究的，我们也有很多独立思考的人就看不惯这种人。一些民族学家骂模仿美国的人类学家，好像他们有独立思考，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提供的理由往往也是来自外国的。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我们在中国做人类学要像西方人类学家一样有胆量,构造一个自己的世界观。虽然我比“啤酒”先生“矮”一点,但是别的人并没有比他“矮”,对不对?

回顾中国人类学,我们刚才很悲观,看到它走了这么一条“螺旋式”的路,是否可以就此认为我们的学科没什么希望了呢?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我们乐观之处的,中国人类学是有它独特的学术遗产的。如果硬是用西学的“三圈说”来套我们的学科史,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类学界一百年来研究过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三圈。第一,说说对“核心圈”的研究。所谓的“核心圈”,主要是指对乡民社会的研究,即人类学家对那些在当下国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群的文化所进行的研究。这个典范很多,最重要的比如说林耀华、费孝通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中国人类学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积累,特别是著名的“燕京学派”综合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乡民社会进行的研究。这是个很好的传统。尽管这个传统在20世纪50年后被禁止(50年代是不能研究农民的,只能宣传模范村,直到改革以后,对“核心圈”的研究才重新开放),但即使是这样,我们在乡村研究中也积累了很多遗产,这个遗产无法一一论说。第二,对“中间圈”的研究积累了更多的成就,而且在50年代得到发展。我说的“中间圈”包括了更多,但我们可以简化地称为“对民族地区的研究”。在我看来,少数民族不是一个个孤独的群体,有史以来就生存在这个华夏中原的“周边”,其流动性极大,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外的关系都极其重要。我们之前称之为“少数民族”,但是他们的人数其实并不少。费孝通

把这一块儿称之为“走廊”，存在着很多流动。这是一个中外之间的圈子。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人类学，特别是“南派”的人类学出现以后，对这个圈子的研究使它变得非常重要，成果不可小视。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第三，谈谈对“外圈”的研究。中国有人类学这门学科一百多年来，第一阶段都是在借用翻译，后面才有自己的学科。即使不算上翻译的阶段，我们也长期存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外国的人类学家，像李安宅教授就是最早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华人人类学家，而且他采用的观点和美国人研究印第安人是不一样的。如果再说得大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大家认识费孝通教授大概都是因为他研究中国的农民，但是以我来看，费孝通教授对我们最有启发的书除了《乡土中国》之外，还有他对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而且这些作品都具有典型的人类学色彩，比如他对美国人的论述。许烺光对中、印、美文化的比较研究则更专业。许先生曾在“魁阁时期”跟随过费孝通，受其启发，他对西方、印度和中国的比较研究显然与费先生相互呼应。我认为对于“外圈”，中国人类学家也作过重要的研究，积累了丰厚的遗产。

中国人类学在“三圈”的研究中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认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所研究的这三个圈子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我们对此却思考得不多。在我看来，如果对于“三圈”之间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中国人类学家则可以触及现存社会理论未深入触及的层次。

“三圈”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关系的实质在于一种等级文化。第一，这三个圈子上下关系在经济上得以表

现：中央朝廷与“核心圈”的关系是赋税式的；“核心圈”和另外两个圈子之间的关系是“朝贡式”的。第二，从仪式、文化和文明上看，这三个圈子也得到了不同的定义。我们也是说上下关系。我们在文化上会把“核心圈”的人，不管其文化高低，称之为“化内之民”；把“中间圈”的人称做“少数民族”，将他们同“外圈”的人合在一起称做“化外之民”；如果再细致点，可以用“生藩”和“熟藩”加以区分。第三，从地方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三个圈子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核心圈”使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行政体系，把这个地方看成是朝廷委任的官员所控制的地区；“中间圈”和“外圈”通常有“土司”和“藩王”，至少在意向上是半独立的，有的是纯独立的（即使是纯独立的，也会被想象成半独立的）。比如，像英国这样的犬羊小国，只不过像我们土司那么大，怎么还自称皇帝、女王，大家都觉得不可接受。我们把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当成是少数民族，政治体制上接近于罗马式的皇帝和王之间的区分。以上关于“三圈”的划分当然局限于正统关系。而人类学家还可以研究“地方性知识”，可以分析不同的圈子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想象，比如说，研究农民怎么看世界，研究夹在中原和外国之间的“少数民族”怎么样实践、怎样看世界。对于外国人，也可以这样研究。

“学科”究竟是什么？现在的社会科学家会立刻答道，是近代欧洲传给我们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方式。我们没有一门学科不是以国家为研究单位的，比如说中国什么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套上一个“国”字、以“国”为单位？这个事实使得我们的研究相对松散，使得那种相对于不以国家为单位的更为

真实的世界观得到了压抑。实际上,没有人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实际上已经替我们指出:近代以来的欧洲社会科学,它的基础和实质都是国家学。按照这个标准,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非国家学。当然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我们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思考到呢?就是因为社会科学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遗憾,我说的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遗憾,而且是欧洲中心主义政治观的遗憾。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探讨很多。

如何理解在中国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国家式的社会科学)?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理解呢?我认为从文化上看是有可能的。从体制上看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我认为欧洲的思想是基于欧洲和印度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它的边界大概是到达我国的西藏,往东则存在着另外一种体系,我们请了一些专家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这两个体系。我也想从神话学角度来看,但最后我自己想得出的结论是:印欧的社会思想往往是以神为核心的,用神来理解所有一切,比如说来理解杜梅齐尔所说的王、祭司和生产者这三者的体系化结合。欧洲社会理论因袭这种神话结构,始终贯串对社会结构普遍性的信仰,其对三者进行的“分层”亦始终坚持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这个原则提供了分类的标准,同时也必须灌输到任何一类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分”和“合”是合一的。我觉得在印度以东也存在另外一种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分类当然还是存在的,但是它强调的不再是一个东西贯穿到任何一个类别中去并以此寻找它的异同,而是看不同的东西存在的关系。中

国社会科学有没有可能基于神话学或者是考古学的研究重新进行社会理论思考呢？在印欧式的神话之下，近代欧洲的国家学不是偶然的，它并不是像华勒斯坦所说的，是国家世俗化的成果，而是具有一个很长远的历史传统。这个历史传统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神这样一种一致性必须穿越王、祭司和生产者这三类人。我国位于西藏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不存在这种穿越的东西，而是存在一条一条的纽带，把不同的圈子和层次关联在一起。中国社会科学提出这“三圈”是要服务于寻找这些纽带。这个区分自身也许并不重要，但它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可能存在一种社会科学不必以国家为单位而研究，而以过程和关系为重心，而且这种过程和关系都具有历史性，不像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在时间上那么浅薄。这也是我认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如此重要的原因之所在。